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城乡融合发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日前,由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年会暨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2025)”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旨在汇聚各界智慧,探索要素平等交换、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践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不断迈向新台阶。本报特辟专版,聚焦本次论坛成果,以飨读者。

共探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

——2025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 本报记者 张涵 冯莉英

七月底的江淮大地,稻禾渐熟。7月26-27日,由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年会暨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2025)”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论坛以“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汇聚国内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知名专家学者,通过主旨发言、主题演讲、平行分论坛等多种形式深入研讨,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贡献智慧方案。

城乡融合激活发展动能,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

论坛上,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阐述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彰显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扫除障碍。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校长助理霍学喜介绍,自2017年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累计超过22万亩,浙江德清等地实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104个县的宅基地改革试点,探索出闲置宅基地转文旅、养老用地的新路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300万人口以下城市落户限制,1.04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速,2023年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7.7%,为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制度保障。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范例。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南京林业大学数字林业与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孔凡斌研究发现,浙江嘉湖片区等试验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优化配置,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对中高收入地区和欠发达区域的带动作用尤为突出,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为城乡要素融合搭建关键平台。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庆亮介绍,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激活资源价值、构建城乡价值链协同体系,集体经济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安徽芜湖市湾沚区66个村发展集体经济,2024年实现经营性收入1.91亿元,村均收益125.29万元,展现了“资源在农村、增值在城乡”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平行分论坛深入研讨,多维度探索融合路径

本次论坛设置了“金融助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城郊经济促进高质量城乡融合”“规划有序与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等8个平行分论坛,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领域展开深入研讨,为实践突破提供新思路。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定祥教授团队关注资金要素在城乡融合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乡村金融面临长期项目融资难、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需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破解农村抵押物缺乏、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开发“村社e贷”“美德积分贷”等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探索“保险+期货”“信托+涉农资产托管”模式,建立农村资产确权交易平台,推动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构建“产业+金融+科技+人才”机制,完善多维信用积分制,为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提供精准资金支持,助力城乡资源高效配置。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学院原院长熊德平从农业强国建设角度指出,城乡融合背景下金融支持农业强国,关键在于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他强调,强化城乡金融协同对此至关重要。研究实证表明,城乡金融发展整体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农村金融的作用需依托农业技术扩散,而城市金融的作用则依赖于城乡间的技术传导。然而,当前存在金融资源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为此,他建议将城乡金融纳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涵,并创新城乡金融协同机制。

专家献策高质量发展,聚焦精准施策与机制创新

针对挑战,专家们提出系列破局建议,为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黄季焜强调,乡村建设需加大投入并关注村庄平衡,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重点支持低收入村发展;建设项目要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根据各地实际确定优先序;强化农民参与机制,落实“为民而建”理念,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建议“十五五”时期重点聚焦四大领域:一是统筹保障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建立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体系,确保种粮农民收入同步甚至更快增长;二是发展多种形式的现代大农业,包括适度规模经营、都市农业、特色农业等,筑牢产业根基;三是加快构建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应对老龄化挑战;四是对633个欠发达县实施分层分类帮扶,制定差别化支持政策,确保欠发达地区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结合“人口流动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指出,县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人口向超大特大城市和县城两端集聚,2010-2020年县城人口增加4100万,占城镇人口增量17.6%,预计2035年县城常住城镇人口达1.9亿,承担2500万落户人口、5000万双城居住人口,需顺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和村庄空心化趋势,优化县域城乡空间布局,增强县城就业吸纳能力,构建20分钟便民圈,推动管网向镇村延伸,建立教育共同体、医联体,促进城乡要素在县域范围内高效流动、优势互补,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



大会现场



平行分论坛现场

金融活水如何精准灌溉县域富民产业？

——访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正平

■ 本报记者 张涵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县域富民产业作为连接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会2025年年会的“金融助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分论坛上,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正平围绕金融支持县域富民产业的实践路径展开分享。会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县域产业特点与金融创新实践,深入解读了这一议题。

富民产业:锚定本质扎根县域土壤

“县域富民产业的核心是‘富民’,必须紧扣‘带动农民增收’这个根本。”张正平指出,这类产业根植于县域,依托本地资源,大致涵盖六大类:特色种养聚焦“土特产”,如绿色农产品集群;产业融合延伸至加工、仓储、销售等环节;乡村新业态挖掘生态文化价值;特色旅游推进“文旅融合”;乡村物流打通农产品出村通道;家庭农场项目如庭院经济、民宿经济等。

他强调,富民产业不能简单等同于单一农业或乡村特色产业,而更可能是“县域一、二、三产业的综合”,“规模可大可小,但必须有活力、就业密度高、联农带农能力强,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三重梗阻:从供需错配到生态短板

谈及金融支持的难点,张正平直指核心痛点:“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高是两大顽疾。”县域小微企业普遍

缺乏规范财务报表,金融机构难以评估风险;且产业数量众多,聚集不足,规模不经济,导致服务成本居高不下。

供需结构性失衡同样突出。“从期限看,现有产品多为短期贷款,难以匹配加工、冷链等中长期需求;从额度看,小额贷款覆盖广却满足不了规模化经营,大额贷款门槛又太高。”他补充道,县域金融机构还面临数字化转型缓慢、净息差收窄、生存压力大等问题,“叠加外部发展环境不佳——数字基建薄弱、产权确权登记不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不到位,进一步制约了金融资源下沉”。

此外,政策与体制机制障碍也不容忽视。张正平提到,虽然相关文件提出要加强部门协作,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资源联动不足,难以形成合力。同时,对金融机构支持富民产业的差异化监管和激励政策有待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缺乏统一标准,各部门信息采集指标、评价体系不一致,影响信息共享效果。

破局路径:产业定制与生态协同并重

“破解难题的关键是,结合产业特征创新金融服务,推动‘精准滴灌’。”张正平列举了多地实践:浙江淳安县的“水产贷”针对水产养殖设计专属产品;云南弥勒市的“产业链贷款”覆盖西葫芦种植全环节,提供“春耕贷”等节点性支持;浙江武义县的“春雨贷”引入“政银担”模式,解决茶农资金垫付难题。

他认为,数字化转型是破题的重要抓手。“线上信用产品如‘微捷贷’、‘商户e贷’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智能化服务;农行南昌分行的‘智慧粮仓贷’,依托物联网对粮企仓储粮食进行24小时可视化监控,以仓储粮食设定浮动抵押担保,破解了粮企

‘抵押难’问题。”此外,微众银行建立的“企业与企业主的双维度数字化风控体系”,结合工商、征信、电力等第三方数据,提升了信用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他特别强调政银企协同的价值,“山东鄄城县草莓产业园通过金融机构与政府协同,支持润土种植专业合作社、天阔草莓基质育苗产业园等经营主体,形成‘种植+采摘+旅游’融合业态;山东东营市垦利区的‘粮食规模种植贷款’,由银行、政府、担保公司共担风险,开辟了‘党建引领、支部领办、金融支持、财政助力’的发展新模式;邮储银行东阳市支行作为东阳木雕红木家具产业创新推出‘红木产业信用贷’,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多方合力:政策托底与市场发力结合

“金融支持不能仅靠市场自发,更需要政策体系托底。”张正平认为,财政政策应强化与金融的协同,加大支农力度,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奖惩机制;货币政策需优化涉农再贷款再贴现、“三农”结构性货币政策,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监管政策要完善普惠金融考核,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

他同时指出,资本市场也应发挥作用,“通过涉农股票债权发行、乡村振兴基金等补充长期资金”。但根本在于“多方协同”。“金融机构要深耕县域、主动创新,政府要优化信用环境、破除制度壁垒,产业自身要夯实基础,才能让金融活水真正灌溉到富民产业的根系。”

采访进入尾声,张正平说道,支持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要勇于担当,面向县域进行战略布局,深耕县域,扎根基层,积极创新,才能赢得未来。“但也绝不能仅靠金融单向推动,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他强调道。

统筹“三化”协同推进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长云

■ 本报记者 张涵

当前,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简称“三化”)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导向。为何要将三者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有何时代特征?城乡融合如何成为关键纽带?带着这些问题,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年会暨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2025)上,记者专访了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长云。

记者: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相较于以往强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纳入新型工业化统筹考量,背后有怎样的战略深意?与我国当下发展阶段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姜长云:这一战略导向的演变,是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从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到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新型工业化纳入统筹范畴,背后是对我国“并联式”现代化特征的深刻把握。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不像西方发达国家是“串联式”推进。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面临高质量发展转型压力,单靠某一“化”难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如,没有新型工业化的技术和产业支撑,城镇化可能沦为“空心化”,乡村振兴也难有持续动力;若忽视乡村振兴,城镇化和工业化又会因“农业农村短腿”陷入不可持续。因此,统筹“三化”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

记者:相较于传统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新”体现在哪里?在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它为何能成为统筹“三化”的“主导力量”?

姜长云:新型工业化的“新”,首先是发展理念的革新。它打破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也不同于我国传统工业化路径,核心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具体来看,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技术导向更“新”,突出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比如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都是典型体现;二是发展目标更“新”,不片面追求产业规模,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对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的支撑,比如强调制造业是创新的发动机,是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的引擎,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更强调高质量发展、产业安全与民生价值的统一;三是协同性更强,注重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联动,比如通过工业先进适用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让工业化成果更广泛惠及城乡。

之所以说它是“主导力量”,是因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新型工业化能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避免“空城化”;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技术和产业动能,比如通过农产品加工智能化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没有工业化的“引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就可能失去持续动力。

记者:统筹“三化”的过程中,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协同点?又需警惕哪些倾向?

姜长云:三者的协同点体现在“相互赋能”。比如,新型工业化能为城镇化提供就业岗位和创新载体,城镇化则通过人口集聚、基础设施共享反哺工业化效率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与城市群发展就是典型,制造业集群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就业质量提升,又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对乡村振兴而言,新型工业化可以发挥的“外溢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工业技术向农业农村渗透,比如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直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工业领域的绿色化、数字化理念,能带动乡村生态振兴、治理升级,比如农村电商依托工业数字化基础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

但需警惕两类倾向:一是“重城轻乡”,若资源要素过度向城市集中,会导致农村“空心化”,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可能受影响;二是“城乡分割发展”,如轻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带动作用,“三农”发展陷入自我循环,难以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并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比如,一些地方乡村产业发展不考虑城市需求,不注意创新产业发展方式,不注意借鉴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并与城市产业联动,最终可能“钱花了、产业没起来”。

记者:城乡融合是统筹“三化”的重要路径。您曾提出可从“城乡连续体”“跨界求解”“网络求解”三个维度推进,能否结合实际谈谈?

姜长云:城乡融合不是“城乡一样化”,而是打破二元分割,让要素双向流动更顺畅。这三个维度本质上是不同层面的“破界”思维。

“城乡连续体”强调城乡是有机整体,而非对立分割。比如,现在很多都市圈正在构建“城区—郊区—县城—乡村”的连续空间,像上海周边的昆山、苏州,城市的智能制造产业向县域延伸,县城的农产品加工又对接城市消费,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链条,这正是《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鼓励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模式。

“跨界求解”则是针对“问题在乡村、根子在城市”的现象。比如,农民增收难,既有农业效益低的原因,更与城市就业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相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成长,也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相关。当前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既要求城市完善就业培训、公共服务,也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同步跟进,让农民“进可城、退可乡”。

“网络求解”则依托交通、数字等网络打破空间限制,注重将农业农村发展融入区域城镇网络、都市圈或城市群网络,形成城乡相融相长关系。比如,现在县域物流网络、5G基站向乡村延伸,农村电商通过直播带货对接全国市场,工业企业的研发中心在城市、生产基地在县域,正是借助网络实现“城乡产业协同”。这与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的要求高度契合。

记者:您在会上提出“将县域作为统筹‘三化’的战略基点”,为何县域能成为关键?在实践中,县域应如何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姜长云:县域是城乡二元结构最薄弱的环节,也是破解城乡发展失衡最易见效的领域。县城上接城市、下连乡村,既能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又能带动乡村发展,推动“三化”协同要注意抓好县城这个“牛鼻子”,做好县域这个基点。具体来看,县域可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做优“县城枢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让县城成为城市高端产业的“配套基地”和乡村资源的“整合中心”。比如安徽肥东、浙江慈溪等地,县城承接了省会城市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同时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农产品加工,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是构建“县域产业网络”,引导中心镇、中心村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乡村发展的“磁力中心”。比如山东寿光以县城为核心,形成“蔬菜种植基地—县城加工园区—城市批发市场”的链条,工业化(加工冷链)、城镇化(县城集聚服务)、乡村振兴(种植户增收)三者联动。三是推动“城乡服务均等化”,将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向县域甚至城郊等乡村延伸。当前政策鼓励“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县城、中心镇延伸”,就是为了让县城既能留住乡村人口,又能吸引产业落地,最终实现“县城强、乡村兴、工业旺”的良性循环。推动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联合体等。